

当代马克思主义与媒介化社会研究丛书

SERIES OF CONTEMPORARY MARXISM AND THE SOCIOLOGY OF MEDIA

回归劳动： 全球经济中不稳定的劳工

姚建华 苏熠慧 / 编著

*Bringing Labour Back In:
Precarious Workers in the Global Economy*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当代马克思主义与媒介化社会研究丛书

SERIES OF CONTEMPORARY MARXISM AND THE SOCIOLOGY OF MEDIA

回归劳动： 全球经济中不稳定的劳工

Bringing Labour Back In:
Precarious Workers in the Global Economy

姚建华 苏熠慧 编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回归劳动：全球经济中不稳定的劳工 / 姚建华, 苏熠慧编著. --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9. 5

(当代马克思主义与媒介化社会研究丛书)

ISBN 978 - 7 - 5201 - 2676 - 2

I. ①回… II. ①姚… ②苏… III. ①劳动就业 - 研究 - 世界 IV. ①F249. 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92140 号

· 当代马克思主义与媒介化社会研究丛书 ·
回归劳动：全球经济中不稳定的劳工

编 著 / 姚建华 苏熠慧

出 版 人 / 谢寿光

责任编辑 / 隋嘉滨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群学出版分社 (010) 59366453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 ssap. com. 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83

印 装 /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21.25 字 数：322 千字

版 次 / 2019 年 5 月第 1 版 201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201 - 2676 - 2

定 价 / 9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读者服务中心 (010 - 59367028) 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总 序

童 兵

中国已经进入媒介化社会，这是千真万确、无可置疑、不可逆转的事实。传播学者施拉姆早就指出，社会的每一个阶段都有着与其相适应的传播方式。究竟是信息塑造了社会组织与社会形式，还是后者加速了传播的发展，争论这些是徒劳的。这二者之间无疑存在着有力的相互作用，互为条件：传播的革新影响着社会，社会的演进同时形塑着传播。因此我们几乎可以说，一部新闻传播史，就是传播的形态与手段同社会组织、社会形态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从而将社会和传播双双推向前进的历史。

无数事实表明，进入新世纪以来，在信息化浪潮席卷全球的背景下，中国的大众传媒得到了迅猛的发展。中国经济总量巨幅增长，社会改革步伐不断加快，不仅国内亿万民众对此欢欣鼓舞，对国家的腾飞和民族的振兴充满期待，这一奇观在国际上也是有口皆碑，中国将在全球经济发展与治理中做出特殊的贡献，国际社会对此寄予厚望。不仅是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取得的长足进步对中国的发展功不可没，科学技术的推动和影响同样不容小觑。特别在大众传媒及产业创新方面，新的科学技术尤其是互联网技术爆发出惊人的能量，它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与人类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深度结合，推动各领域的深刻变革，潜移默化地影响和渗透人们的日常生活方式与思维方式。中国能够进入媒介化社会，且产生这么深远的影响，科学技术在其中所发挥的关键性作用是有目共睹的。

但是世界上不可能到处是玫瑰花，处处时时芬芳浪漫。媒介化社会也会伴生另外一些景象，生发许多意想不到的问题。人人成为记者、个个执掌麦克风以后，价值观的多元且不合主流的价值表现“俯拾皆是”。自媒

体有的正派、高尚，成为媒介化社会亮丽的风景线；有的则成为充斥着虚假、欺骗、攻击、谩骂、恐怖、色情、暴力的媒介空间，它们带来的消极作用甚至引起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就曾强调让网络空间天朗气清、生态良好，符合人民利益。这种正反相背的事实告诉我们，为了确保媒介化社会健康有序的发展，我们一定要遵循网络运行的客观规律，媒介化社会必须有规矩、讲秩序、守纪律。

在媒介化社会中，对劳动力的组织、配置、调动、管理、奖惩也必须讲程序、讲规矩、讲科学。但是，由于媒介化社会在中国初建，我们对劳动力的管理还没有经验，对它的调动、组织规律还不够了解，很可能时不时地出现新的问题、新的矛盾。与此同时，在对劳动力的管理过程中，媒介化运作的客观环境引发了一系列亟须认真解决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譬如劳动者的收入无保证、社会福利无保障，而管理方对此却束手无策。由姚建华博士主编的这套“当代马克思主义与媒介化社会研究丛书”从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视角切入，围绕着上述问题展开，试图比较客观地揭示在媒介化社会初期难免会频繁出现的“不稳定”状态，破解其中的原因和规律，寻觅解决难题的方法和路径。我看到，丛书的不少作者正是沿着这种思路在努力工作。我没有把握说他们的观点一定全面、一定能够站得住、一定正确，但我欣赏他们的勇气和勤奋。这一点，发言权最终握在读者诸公手里。

2019年3月

目 录

导 言

回归劳动：全球经济中不稳定的劳工

苏熠慧，姚建华 / 001

第一 部分

理论引介：

全球经济、不稳定性与劳工研究

/ 023

不稳定的无产者：从失权者到公民

盖伊·斯坦丁，周 洋（译），姚建华（校） / 025

新瓶装旧酒：全球化、劳动与不稳定的无产者

罗纳尔多·蒙克，孙 萍（译），姚建华（校） / 050

工人阶级不稳定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与当今的关联

贾米尔·乔纳，约翰·福斯特，苏熠慧（译），姚建华（编校） / 073

第二 部分

全球经济中不稳定的劳工：

西方的实证研究

/ 095

不稳定的工作、无保障的工人：转型中的雇佣关系

阿恩·考利博格，那宇琦（译），

苏熠慧、姚建华、徐偲骞（校） / 097

自由鸟：印度手机制造业中的新“不稳定的无产者”

安妮贝儿·费鲁斯-科米罗，仝晓霞（译），

苏熠慧、姚建华、徐偲骜（校）/ 133

系统偏误：微软公司中劳工的不稳定性和集体组织

恩达·布罗菲，盛 阳（译），姚建华（校）/ 150

不稳定的玩工：游戏模组爱好者和数字游戏产业

尤里安·库克里奇，倪安妮（译），姚建华（校）/ 177

第三
部分

当代社会转型中不稳定的劳工：
中国的实证研究

/ 193

中国国有企业中的不稳定劳动与二元劳动体制的兴起

——基于对四家国有企业的比较分析

贾文娟 / 195

从“赶工游戏”到“老板游戏”

——非正式就业中的劳动控制

郑广怀，孙 慧，万向东 / 216

劳动力的商品化与不稳定的学生工劳动体制

——以申厂为例

苏熠慧 / 246

知识女工与中国大陆出版集团的弹性雇佣制度改革

曹 晋，徐偲骜、姚建华（校）/ 267

新媒体语境下众包新闻生产中的弹性雇佣关系研究

姚建华，刘 畅 / 290

强控制与弱契约：互联网技术影响下的家政业用工模式研究

梁 萌 / 301

后 记

/ 326

Contents

- Introduction** Bringing Labour Back In: Precarious Workers in the Global Economy
Yihui Su, Jianhua Yao / 001
- I Theoretical Foundation: Global Economy, Precarity and Labour Studies** / 023
- The Precariat: From Denizens to Citizens
Guy Standing, Yang Zhou (translator), Jianhua Yao (proofreader) / 025
- Old Wine in New Bottles: Globalization, Labour and the 'Precariat'
Ronaldo Munck, Ping Sun (translator), Jianhua Yao (proofreader) / 050
- Marx's Theory of Working-Class Precariousness—And Its Relevance Today
Jamil Jonna, John Foster, Yihui Su (translator), Jianhua Yao (editor and proofreader) / 073
- II Precarious Workers in the Global Economy: Western Perspectives** / 095
- Precarious Work, Insecure Workers: Employment Relations in Transition
Arne Kalleberg, Yuqi Na (translator), Yihui Su, Jianhua Yao, Sisu Xu (proofreader) / 097
- 'Free Birds': The New Precariat in India's Mobile Phone Manufacturing
Anibel Ferus-Comelo, Xiaoxia Tong (translator), Yihui Su, Jianhua Yao, Sisu Xu (proofreader) / 133

- System Error; Labour Precarity and Collective Organizing at Microsoft
Enda Brophy, Yang Sheng (translator), Jianhua Yao (proofreader) / 150
- Precarious Playbour; Modders and the Digital Games Industry
Julian Kücklich, Anni Ni (translator), Jianhua Yao (proofreader) / 177
- III Precarious Workers in China's Contemporary Social Transformation**
/ 193
- Precarious Work in China's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nd the Rise of
Dualistic Labour Regime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Four SOEs in China *Wenjuan Jia / 195*
- From 'The Game of Making Out' to 'The Game of Boss': Labour Control
in the Informal Employment
Guanghuai Zheng, Hui Sun, Xiangdong Wan / 216
- The Commodification of Labour and the Precarious Student Labour Regime
in Shen Factory *Yihui Su / 246*
- Female Knowledge Workers and the Flexible Employment Reform in
China's Publishing Conglomerates *Jin Cao,*
Sisu Xu, Jianhua Yao (proofreader) / 267
- Flexible Employment in News Production Crowdsourcing in New Media
Jianhua Yao, Chang Liu / 290
- Strong Control and Weak Contract: A Study of Employment in Domestic
Labour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Internet *Meng Liang / 301*
- Postscript** */ 326*

回归劳动：全球经济中不稳定的劳工

苏熠慧，姚建华

2011年，盖伊·斯坦丁（Guy Standing）的新著《不稳定的无产者：新危险阶级》（*The Precariat: The New Dangerous Class*）出版。他在书中使用了一个重要的学术概念——“不稳定的无产者”（*precariat*）——来描述全球化经济下新的劳动形式和劳动者的新状态。此书一经出版，便在劳工问题研究领域引发了学者们广泛的争议。一些学者认为斯坦丁找到了分析21世纪雇佣关系的新棱镜，而另一些学者则认为此概念受限于他“全球北方”（*Global North*）的视角，不仅忽略了亚非拉等“全球南方”（*Global South*）长期存在的非正规用工形式，还有“新瓶装旧酒”的嫌疑（Munck, 2013, 2016）。此外，这一概念也受到许多马克思主义者的批判。在他们看来，资本主义经济的早期发展就伴随着劳动的不稳定性，马克思早已使用“产业后备军”的概念来概括这一状态，斯坦丁的“不稳定的无产者”与此概念相比，并无多大创见（Jonna and Foster, 2016），且与马克思的“工人阶级”和“无产阶级”概念也并不存在明显的差异（Wright, 2016）。本书的导言将从斯坦丁“不稳定的无产者”的概念出发，分析此概念背后所呈现的全球政治、经济转型的过程，并从学术谱系的维度梳理这个概念的形成、发展及其所引发的讨论；在此基础上，批判性地思考这一概念对研究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中劳动关系的启发和局限性，旨在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本书的核心观点。

一 新自由主义的资本全球化

20世纪70年代以来，伴随着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市场的建立，劳动越

来越呈现出“不稳定”（precarious）的特征（Barbier, 2004; Fudge and Owens, 2006; Vosko, 2000; Standing, 2011），而这种特征在2008年全球范围内的金融危机后变得愈发明显（Allison, 2013; Fashoyin et al., 2013; Fudge and Strauss, 2013; Kalleberg, 2011, 2012; Olsthoorn, 2014; Vosko, 2010）。以美国为例，美国在二战后的30年间经历了经济的飞速发展，工人不仅获得了良好的就业机会和工作保障，还受益于大量的社会福利。在此期间，美国国会出台了大量的法律用来规范工人最低的工资保障、养老金和失业保险，赋予工人集体协商的权利，并极大地限制了雇主对雇佣关系的控制权，使工人与企业之间有效的社会契约关系得以确立，以此来实现经济的稳定增长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Kalleberg, 2009）。但到了20世纪70年代，美国社会却完全倒向另外一面：工人因愈发灵活的工作而变得越来越缺乏稳定性和制度性的保障，他们劳动合同的时效性不断缩短，长期失业人数总量持续增长。劳动者个体常常陷入对失业的担心和焦虑之中，他们只能成为企业的合同工、临时工或外包工。这也就意味着，他们需要承担更多的风险，却缺乏基本的社会保障和安全感（Kalleberg, 2009）。

贝弗利·西尔弗（Beverly Silver, 2003）用“合法性危机”和“利润危机”这组体现资本主义内部张力的概念对此现象进行了阐释。在西尔弗看来，当资本主义将工人剥削到极致，就会出现“合法性危机”（crisis of legitimacy），即工人罢工，要求改变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从而迫使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各种福利制度；而当资本主义国家为工人提供各种工作保障和福利制度之后，资本主义体系又会遭遇“利润危机”（crisis of profit），即资本的积累变得有限，从而使资本通过各种“修复性”（fix）的手段来重新获得积累，例如将生产方式变得更为灵活、在全球范围内“猎身”更为廉价的劳动力等。因此，资本主义总是在“合法性危机”和“利润危机”中循环演进（Silver, 2003）。这种循环亦如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笔下钟摆式的“双向运动”（double movement）——“钟摆”一会儿摆向推行经济自由主义的政策和建立灵活的市场，一会儿则摆向构建有利于保护大众的社会福利制度（波兰尼, 2007）。如果说美国20世纪30年代旨

在为工人提供稳定的工作保障，有利于工人与企业之间建立稳固社会契约的制度建设是西尔弗所描述的“合法性危机”的产物抑或是波兰尼笔下的社会保护运动；那么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则是西尔弗所指涉的“利润危机”的产物，即波兰尼笔下的市场运动。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加速了全球资本主义的扩张，同时也重组了被称为“全球北方”的第一世界国家内部的劳资关系。这种以全球资本扩张为背景的劳资关系的重组具体表现为：原先为工人提供稳定工作保障的法律被修改、政府的“去管制化”（deregulation）、社会福利的“商业化”（commercialization），以及工会（作为保护工人权益的传统的制度资源）的持续衰弱。在美国，20世纪80年代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总统实施的公共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美国劳工的力量，放松了政府对资本的管制，这导致了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工人曾经享受的集体性的“社会福利制度”完全被个体主义式的“工作福利制度”所取代（Kalleberg, 2009）。在欧洲，1979年3月，欧共体当时的12个成员国决定正式开始实施欧洲货币体系（European Monetary System, EMS）建设规划。1991年12月，这些成员国又签署了《政治联盟条约》和《经济与货币联盟条约》，规定最迟于1999年1月1日前建立欧洲货币联盟（Economic and Monetary Union, EMU）。这两项条约的出发点就是要通过在联盟内成立中央银行，统一货币（欧元）和实行统一的货币政策，促进成员国经济和贸易的共同发展。伴随着欧洲货币联盟的建立，欧洲金融市场的一体化、融资活动的全球化、政府的去管制化，以及劳动力流动的自由化应运而生（Streeck, 2011）。虽然在欧洲货币联盟成立之后，欧盟各国经历了短期的经济增长，但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也遭受重创。在应对经济重创后的恢复过程中，欧盟各国政府仍然继续实施劳动力市场自由化、鼓励临时用工的政策（Prosser, 2016）。即使在此政策下，欧盟中一些国家的经济仍处于停滞或萧条的状态，且大量劳动力饱受失业的威胁和煎熬。

与此同时，新自由主义下的经济全球化导致了“劳动力市场弹性机制”（labour market flexibility）的形成，这引发了工资、雇佣关系、工作制度和劳动者技能的弹性化（Standing, 2011），具体表现为：其一，数量上

的弹性，即各种灵活的用工形式（临时工、兼职工、散工、独立和非独立合同工、实习生和休假工）开始替代长期固定的劳动力雇佣模式；其二，功能上的弹性，即工作任务的快速调整和频繁变动，内部劳动分工变得更为灵活，离境外包（outsourcing）成为一种普遍且有效的组织生产的方式；其三，工资系统的弹性，即货币工资占劳动者收入的比重不断上升，而非工资性质福利的比重则持续下降。对于劳动力而言，原本具有规律性的、可预测的工资，被弹性的、不可预测的收入逐渐替代（Standing, 2012）。劳动力市场的这些弹性机制带来了雇佣关系和劳动者身份认同的骤变。这些弹性的工作方式同样存在于“知识劳动”（knowledge work）、“非物质劳动”（immaterial work）、“创意劳动”（creative work）等各种新型的非工业化劳动之中。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资本的全球化扩张需要依托信息化的平台，而在信息产业、创新创业及各种服务业中，弹性雇佣制度（flexible employment）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实践——这些行业中的工作要求（如灵活变化的工作任务和弹性机制）不仅改变着劳动者的劳动形式，也改变着他们在工作场所之外的生活方式。

此外，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全球化也通过资本的空间转移，将生产“外包”给第三世界国家。亚洲、非洲、南美洲的许多国家纷纷被纳入全球产业链的生产过程，为全球资本提供大量廉价而灵活的劳动力。一方面，大量年轻的劳动力背井离乡，脱离家庭和社区的庇护，在缺乏安全保护的劳动环境中工作，同时缺乏国家提供的福利。另一方面，“劳动力市场弹性机制”也出现在这些国家的传统工业领域和新兴产业部门，使得传统和新兴产业中的用工方式和内部劳动分工都变得愈加灵活。

二 “不稳定性”的研究系谱

1. 马克思的“产业后备军”概念

斯坦丁并不是第一个提出“不稳定的劳动”（precarious labour）的学

者。马克思早在《资本论》第一卷的第二十三章《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中就提出，“过剩的工人人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的一个条件。这些过剩的工人人口形成了一支“产业后备军”（马克思，1975：693）。在这一章中，马克思描述了“产业后备军”的四个特征，即流动性（floating）、潜在性（latent）、停滞性（stagnant）和赤贫性（pauperized）。贾米尔·乔纳（Jamil Jonna）和约翰·福斯特（John Foster）认为这四个特征清晰地表明，资本主义从诞生初期就伴随着一支不稳定的劳动力大军（Jonna and Foster, 2016）。这支不稳定的劳动力大军在马克思那里是资本主义积累的重要基础，他们包括有劳动能力的赤贫人群、孤儿，以及需要救济的贫民子女等（马克思，1975）。

2. 边缘性、非正规性与社会排他性

20世纪60年代，随着亚非拉等“全球南方”地区逐渐被卷入新自由主义的资本全球化，一些学者开始使用“边缘性”来概括在拉丁美洲国家中，大量未充分就业的移民所具有的根本性特征。这些移民是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产物——他们通常聚集于大城市的边缘地带，只有临时性的住所。在研究者看来，这一群体对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毫无用处（Munck, 2013, 2016）。

但很快，一部分学者便对上述论断进行了批判，认为这一研究范式将“正规就业”和“非正规就业”进行了“二元对立”。他们深刻地洞察到：这些处在城市边缘地带，从事“非正规工作”的群体不仅具有强大的社会支持网络，同时也为拉丁美洲国家的整体经济贡献着相当的利润（Munck, 2013, 2016）。20世纪70年代，学者们开始用“非正规行业”（informal sector）的概念取代“正规及非正规就业”的概念。基思·哈特（Keith Hart）阐释了“非正规行业”与“正规行业”之间的差异性：在“正规行业”中就业的劳动者拥有一份工资收入稳定的工作，而在“非正规行业”中就业的劳动者主要采取自我雇佣的方式（Hart, 1973）。之后，这个概念被国际劳工组织（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用来指称各种在劳动法、劳动合同等法律规制之外的劳动力就业的岗位或部门（ILO,

1972)。与此同时，我们不难发现：“非正规行业”起初与在亚非拉等“全球南方”国家中的自雇职业者勾连，但随着20世纪70年代第一世界国家纷纷进行新自由主义的改革，学者们逐渐意识到“非正规行业”不仅大量存在于“全球南方”，成为其普遍的经济特征，而且它作为全球资本积累的重要基础，开始蔓延到第一世界的“全球北方”国家（Portes, Castells and Benton, 1989）。

这个概念一直沿用至今。虽然20世纪80年代欧洲开始使用“社会排斥性”的概念来意指金融资本“肆虐”下，缺乏社会保障的“新贫困人口”（the new poverty），但“非正规性”在描述全球化的雇佣关系和劳动方式方面仍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和阐释力（Munck, 2005, 2016）。“社会排斥性”则更多地揭示出社会区隔的日趋深化，底层群体和移民群体被主流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不断排斥和抛弃的过程。

3. 布迪厄的“不稳定性”概念

20世纪90年代，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针对社会排斥的日渐加剧，提出了“不稳定性”的概念。布迪厄的不稳定性概念直接与马克思的“产业后备军”概念相关。他认为，“不稳定性”指的是这样一种状态，即“存在着大量的劳动后备军……给予那些工作中的人们可以随时被替代的感觉”（Bourdieu, 1999: 82）。在他看来，“不稳定性”在某种程度上也体现出马克思强调的流动性、潜在性、停滞性和赤贫性。布迪厄在此基础上，提出“亚无产阶级”（sub-proletariat）的概念来描述处在“不稳定”状态中的劳动者（Bourdieu, 1999: 83）。但乔纳和福斯特认为，布迪厄并没有说清楚“亚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本质性的区别。在他们看来，“亚无产阶级”不同于“无产阶级”，他们并不能承担起“革命”的重任（Jonna and Foster, 2016）。

4. 意大利自治马克思主义者的大众概念

与布迪厄的“亚无产阶级”类似的是意大利自治马克思主义者（Autonomist Marxists）迈克尔·哈特（Michael Hardt）和安东尼奥·奈格

里 (Antonio Negri) 提出的“大众” (multitude) 概念。在 2004 年出版的《大众：帝国时代的战争与民主》 (*Multitude: War and Democracy in the Age of Empire*) 一书中，两位作者用“大众”来描述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全球化下，意大利去工业化，并采用劳动力弹性机制后劳动者的认同状况。他们认为“大众”不同于“人民” (people)、“群众” (mass) 和“无产阶级”，是一群处于不稳定的劳动中，但在“社会生产” (social production) 方面有共同特征的人群 (Hardt and Negri, 2004: xv)。这里的“社会生产”不仅指的是物质生产，还包括沟通、社会关系和生活方式等面向的生产 (Hardt and Negri, 2004)。21 世纪的劳工问题研究者不仅发现劳动者在新自由主义资本全球化的影响下呈现个体化的特征，而且他们尝试着从“文化”层面来描述这些处于“不稳定”状态中的劳动者的身份认同。

5. 斯坦丁的“不稳定的无产者”概念

与两位意大利自治马克思主义者相类似，斯坦丁聚焦于新自由主义资本全球化背景下，劳动者的劳动状态和认同。他从生产关系 (relations of production)、分配关系 (relations of distribution) 和与国家的关系 (relations to the state) 三个维度展开对“不稳定的无产者”概念的阐释 (Standing, 2012)。

首先，在生产关系方面，不稳定的无产者中的大多数人以临时的或短期的工作为生，经济收入相对较低或不稳定，雇佣关系短暂，缺乏长期的职业目标和职业前景，无法在工作场所中建立长期的人际关系，这使得他们缺乏安全感和认同感，缺乏与工作相关的社会记忆。其次，在分配关系方面，他们无法享受到那些福利国家时代工人和白领领薪阶级所享有的各种形式的劳动保障，缺乏社会福利。最后，在与国家的关系方面，他们只是“失权者” (denizen)，而非“公民” (citizen) ——他们要么没有政治权利，无法参与所属社区的政治生活，没有资格投票或参与政治竞选；要么没有文化权利，无法开展特定的文化活动；要么没有社会权利，无法享受当地的社会福利 (Standing, 2011, 2012)。

在此基础上，斯坦丁进一步揭示出社会收入结构中所体现的“无保障

性”的根本特征（Standing, 2012）。根据斯坦丁的定义，“社会收入”（social income）指的是劳动力所有来源和形式的收入的总和，包括由来自生产、货币工资、企业非工资福利、社会福利、社区福利（来自家庭或所在地社区）和私人福利（来自投资和储蓄）六个方面的收入组成（Standing, 2009, 2011）。斯坦丁强调了社会收入和工资收入之间本质性的差异在于前者涵盖了劳动者享受的社会福利，体现了社区的支持和国家的保护（Standing, 2011）。“不稳定的无产者”面临的核心问题不在于工资收入的高低，而在于缺乏社区支持和国家保护——他们往往因脱离来自私人、企业和国家的保障，身陷社会收入低下的困境（Standing, 2011）。

在斯坦丁看来，以下群体极易成为“不稳定的无产者”：那些不能通过教育获得回报的年轻人、各个年龄段的女性劳动者、老年人、残障人士，以及缺乏公民权的境内外移民（Standing, 2011, 2012）。

毫无疑问，这些“不稳定的无产者”处于新社会结构中的下层。斯坦丁将新社会结构中的阶级具体划分为：第一层是富可敌国的“精英阶级”（elite），第二层是享受小康生活的“白领领薪阶级”（salarariat），第三层是拥有知识和技术的“专业技术人员”（proficians），第四层是“核心工人阶级”（core working class），第五层才是“不稳定的无产者”，在其之下是“失业者”（unemployed）和“流氓不稳定的无产者”（lumpen-precariat）。斯坦丁强调，一方面，“不稳定的无产者”是一个“自在的阶级”（a class-in-the-making），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经历着不安全和不稳定的工作和生活，且时刻需要面对不同的社会问题、内心的孤独感和对仇恨的恐惧（Standing, 2012）。这些共同的境遇使他们成为一个“新的危险阶级”（Standing, 2011, 2012）。另一方面，“不稳定的无产者”还未形成一个“自为的阶级”（a class-for-itself），他们缺乏清晰的阶级意识，且往往互相责难，异常脆弱，内部也充满着激烈的斗争（Standing, 2011）。

三 “不稳定性”的全球扩张

“不稳定性”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之后，成为全球雇佣关系和劳动方